

1938年日军扫荡曲阳、阜平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她再次申领到4万余元赈济灾民。她的乡村医院，也得到曲阳县边区政府的支持，当日军占领县城后，曲阳县政府就设在宋家庄。

1939年初，英国青年乔治·何克想以美国合众社记者身份进入晋察冀采访。在我地下党安排下，他乘车来到定县，不幸感染伤寒。凯瑟琳正巧也在这家小旅店，她为何克注射了药物，并把他拉到宋家庄诊所，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，何克奇迹般的康复。聂荣臻闻讯，派人送来邀请函，欢迎何克做广泛的采访。后来他不但受到朱德、聂荣臻的友好会见，还被安排采访白求恩医疗队和八路军指战员。不久，何克在美国出版了《我看到了新中国》一书，深入报道了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表现，引起了世界舆论关注。

聂荣臻司令员对凯瑟琳格外尊重。告诉她：“你信上帝，我们共产党也信上帝。不过你们信的是耶稣，我们信的是劳苦大众，我们就是在为他们工作。”凯瑟琳看到八路军为保护老百姓与日军浴血奋战，开始钦佩这支人民军队。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共产党人广阔的胸怀像大海，只有他们才能使中国改变面貌。因为他们有严明的纪律，能给人们带来积极、热情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。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真是好，好得你不能不帮助他们。”

应聂将军请求，凯瑟琳冒着巨大风险，帮助八路军购置了急需的收发报机、内燃发电机、电池、机油、汽油、电线和医药用品。同时，她还在宣武门教堂、王府井大街和燕京大学建立了秘密联络站，通过



上图：正在进行战地手术的白求恩。

反复动员，她把晋察冀军区急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带入太行山。郭庆兰原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，在她动员下参加了八路军，后来嫁给印度医生柯棣华。郭在回忆录中写道：

“凯瑟琳计划得很周密，我和她登上了只允许日军和外国人乘坐的二等车厢。车厢坐满了日本兵，个个枪不离身，我们周围全是日本兵。第二天到定县后，两辆大车迎接我们。车上装了一些木箱和竹箱，上面是药品和医疗器材，但箱子下面却藏着无线电设备和军用物资。面对日军严格盘查，凯瑟琳格外镇定。她掏出护照给他们看，介绍我说是她的助手。”其实，作为一个女性，凯瑟琳一次次通过日军哨卡时怎会不紧张呢？她写道：“每次从日本人的刺刀前经过，都仿佛是经过炼狱一般。”

凯瑟琳对日军暴行深恶痛绝，对中国的抗战冒险相助。每当日军大扫荡时，她就会在宋家庄诊所挂

起英国国旗，掩护来不及转移的八路军伤员和妇女儿童。面对日军的盘查，她神情泰然，毫无畏惧。白求恩翻译董越千的妻子王兰珍与两个孩子住在北平，分别已经一年多了。当她得知董越千急盼与家人团聚时，马上说：“董，给你妻子写个便条，我有办法让你们团聚。”不久， she就把董越千的妻子和两个孩子，还有王兰珍的姐姐带了回来。凯瑟琳为解决八路军医务人员紧缺困难，动员安国博爱医院院长杜场曾等12人带着医药物资后投奔后方医院，极大缓解了八路军缺医少药的困难。

凯瑟琳为八路军采购药品的事最终还是被日军发现。当她最后一次回到宋家庄时，看到的是她的诊所化为废墟。她马上返回北京，准备申请重建资金。但日本人已向英国提出抗议，要求把她立即驱逐出中国，并办下她的回国护照。彻夜未眠的凯瑟琳想好了，此时任何和她接触的人，都会遭到怀疑和连累，即使她回到太行山也不能再为八路军运送任何物资了。临行前，她给聂荣臻、白求恩写了信，尽管她知道，这些信可能根本到不了他们手中。凯瑟琳没有想到，几天后白求恩来到宋家庄，准备邀请她去医疗队，并给她送来自己署名的聘书。没有见到她的白求恩失望地离开宋家庄。临走时，他给凯瑟琳写了一封信，让李中玉捎给她。

直到凯瑟琳的诊所被毁，她被日军驱逐后，白求恩才知道，凯瑟琳不但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，而且经常夜里带着聂荣臻将军送给她的爱犬，为八路军伤员和当地百姓巡诊。在聂将军心中，她是心怀正义，值得永远怀念的国际友人。1990年，